

香港贫穷,教会有责!

Poverty in Hong Kong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Church

李碧霞 余达心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Bixia Li Carver Yu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Theology

[Abstract] Hong Kong is a world famous metropolis with GNP per capita at over HK \$ 210,000 in 2004 despite the devastating economic effect of SARS. However, there are over 450,000 who live under the poverty line in the city, with monthly spending less than 4,000. This essay attempts to look at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 Hong Kong and discuss how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may respond.

引言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会、举世知名的金融贸易中心。纵然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根据日本第一劝业总研于1998年5月上旬所发表的周年报告,香港仍是世界上生活费最高昂的一个城市。^①香港的富豪,在全亚洲最富裕的一百位人士中,香港占了13位,如

① 郭乃弘,《迈向新世纪的香港教会》,第37页。

我们熟识的新鸿基郭氏家族，就是排行第二，恒基的李兆基家族、长江的李嘉诚家族，亦分别排行第四和第六等。^① 香港表面上真是一个极其富裕的国际都会，没想到贫穷问题其实相当严重，而香港社会存在着的严重的不平等及财富分配的不均，亦是当地重要的社会议题。

本文尝试从香港的贫穷现况中分析形成贫穷的社会因素是什么，并从社会性的角度去评论香港这个贫穷问题，继而重点去从神学立场去探讨贫穷在信仰里的教导，福音又如何切入这问题，并作出一些具体建议给教会反思贫穷这一课题。

一、香港贫穷的现况

80年代初周永新博士已在其《富裕城市的贫穷——香港贫穷现象剖析》一书中，提出香港的贫富差距现象已到了一个可足忧虑的情况；当时全港约有13%住户处于相对匮乏的贫困生活之中（周永新，1983）。根据黄洪博士在过去数年来所作的研究里，并在2005年2月向立法会扶贫小组提交有关香港贫穷定义与量度的陈述的文件中，简介了在80年代中至90年代末，香港虽然经济出现高速的发展，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74,524元增至1998年的189,621元。但贫穷问题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减退，反而出现严重恶化的趋势。在90年代中香港不同学者提出多项有关香港贫穷的研究，这些研究对贫穷虽然有不同的定义或量度方法，但其结论及共识却都是认为香港的贫穷问题相当严重，有超过60万人即10-15%的人口生活仍在贫困之中。

^① 郭乃弘，《迈向新世纪的香港教会》，第38页。

贫穷这问题牵涉到不单只是政府财政,还有其政治因素和香港的国际形象的因素等。在 1998 年香港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和经济危机下,政府官员也不得不在 1998 年 10 月首次引用了国际贫穷线的标准,公布全港有 70 万劳动人口属于贫穷线下。政府经济顾问邓广尧更在立法局会议上公布这 70 万的贫穷人口时就引用了 1996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以本港工资中位数约 1 万元计算,工资中位数的一半即 5000 元,若这个家庭的总收入除以总家庭人数后人均家庭收入是低于 5000 元,这个家庭就是贫穷。政府也估计有 70 万 15 岁以上的劳动人口跌入贫穷线之中,当中有 13 万属于有工作的低薪工人。^①

最近,根据香港城市大学在 2002 年 7 月也公布了一个名为“香港贫穷线及最低生活保障线”研究结果^②,发现有以下的数字:

(一)香港恩格尔曲线的转折点^③是在人均开支 \$ 3,750 港元,即整体的贫穷线处于该水平。

(二)全港共有四十四万九千个住户的人均开支少于 \$ 3,750 港元,占全港住户的 28%,即研究所指的香港贫穷户。研究发现处于贫穷线以下的住户的人均总开支每月平均只得 \$ 2,520 港元,食物的人均开支的平均数是 \$ 1,058 港元,贫穷户普遍有“缩食”的情况,每人每天只有 \$ 35 港元食物开支,有 11 万的贫穷户每人每天食物开支更少于 \$ 24 港元。

负责是项研究亦是黄洪博士,他表示:“调查发现有些贫穷户

① 黄洪,《贫穷的定义与量度》,立法会 CB(2)915/04 - 05(04)号文件,2005。

② 此研究目的是探讨本港日趋严重的贫穷及贫富悬殊问题,利用有关的分析数据,监察贫穷人口的数量及贫穷程度的变化,并建议政府制订正式的贫穷线及有效的政策以解决贫穷问题。

③ 恩格尔曲线的转折点(inflexion point)是国际通用来定义贫穷线的指标,指住户食物开支占住户总开支的比例随着住户总开支的变化。

的基本生活更因为贫穷原因而受到影响,约有四成贫穷户曾为节省金钱而不搭乘巴士;有三分一贫穷户曾因经济问题而经常不开灯以节省电费;有三成贫穷户在过去一年曾因经济问题而不派发利是给亲友;有四分一贫穷户曾于街市关门后才购买食物;此外,亦有两成贫穷户有家庭成员没有固定睡床。”

研究更反映有少数贫穷户连医疗及食物等基本生存权利亦因为贫穷原因而不能维持。有近一成贫穷户因经济问题于生病时未能购买药物,以及每 15 户贫穷户之中便有一户于过去一星期内最少有一餐未能食饱。

另外从坚尼系数(Gini-coefficient)^①也反映出贫富悬殊的程度。一般已发展了的欧美国家,其系数大概为 0.2 至 0.25。0.5 的系数已经是到相当惊人的程度。香港在 2001 年的坚尼系数却是达至 0.525。

还有一点要清楚的,香港存在着不同类别的贫穷者,有些贫穷者的存在比较明显,如老人、失业人士的贫穷的问题比较受社会重视;亦有些贫穷者的问题比较隐蔽,如妇女及有工作的贫穷者的问题便较少受到关注。但除了上述人士外,不少“新穷”(New Poor)是如单亲妇女、新移民及低收入人士是由于其工作机会被剥夺或被排斥,或遭到多重的压迫和剥削而导致其贫穷。

“贫穷”其实是一个较难提供单一定义的词汇,学者们虽曾就贫穷作出了不同的界定,然而以下的区分和定义是较为容易理解和掌握:

贫穷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别,“绝对贫穷”,“基本贫穷”和“相对贫穷”。“绝对贫穷”指那些生活低于生存最低水平,衣食住行方面

^① 坚尼系数是用来量度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情况,系数由零(即没有差距)至一(差距的极限)。

出现极度缺乏,其状况有危及生命之可能。“基本贫穷”指那些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常捉襟见肘,常要忧柴忧米,却未危害生命的生活状态的人士。“相对贫穷”是指那些因经济不平等的发展下,出现贫富悬殊的两极化的贫穷人,他们的收入低于个人入息平均数或中位数一半的家庭,因着“相对匮乏”(relative deprivation)而未能参与社会习俗的活动,经验社会不公义而感到无力的人士。^① 而从香港的贫穷现况,若根据城大的研究,就是属于后二者的贫穷。

二、从神学反省看香港的贫穷

首先在神学立场反思贫穷时,可给予我们另一个角度去认识这个课题,神学家积依路(Jacques Ellul)认为贫穷人在圣经中占着中心位置;贫穷这问题并非社会性或经济性,归根究底乃是属灵的问题。穷人成为了神向教会发出的挑战,本港中产为主的教会怎样回应,就是我们对信仰委身的考验。胡志伟牧师更在其一篇文章《关怀贫穷行动的神学反省》中,从下列的六大范畴作出反省,笔者转载其要点如下:

三一神观:上帝特别关心贫穷人(诗 146:7~9;路 4:16~21; 14:12~13,16~24;林前 9:23),他记念(诗 9:12),他安慰(赛 49:13),他拯救(伯 5:15;耶 20:13)。耶稣道成肉身,进入人世间,自甘贫穷(腓 2:6~8;林后 8:9)。与人立约的神,透过契约神吩咐我们当关怀贫穷人(出 22:21~24;申 15:13~15;彼后 1:7)。三一神观强调神本身在施与受的关系中契合,创造主同样期望人类社群在多元发展中共融。

^① 参考廖五妹的“时代的把脉——福音与香港社会的边缘人”,《谁是贫穷人》;孙励生“香港社会里的贫穷问题”,《思》,第40期。

创造观：每个生命不论贫富是上帝创造的，有上帝的形像，有人性的尊严（创 1:28, 9:6）。神原先创造的秩序是和谐与美善，然而罪入了世界，人的自私与贪婪使物质的分配失调（罗 5:12）。基督救恩成就“更新的创造”（Re-creation；林后 5:17），击破罪的辖制，保证穷人有得胜的应许，赐下坚忍与盼望等待终末万物的更新（罗 8:22~25）。我们不幻想贫穷问题可在今世解决，唯有在新天新地才能真正消贫（启 21:3~5）；但我们此方面的奋斗，朝向上主创造次序的重建是神肯定的。

天国观：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神对贫穷人认同的历史明证（太 2:13~15, 19~23, 8:20；路 9:3, 10:4）。天国的好消息，耶稣称为“给贫穷人的福音”（路 4:18, 7:22）。福音不单针对人灵性的需要，同样顾及人肉身的需要；当贫穷人与贫穷和不义争战，圣经肯定神站在他们那方（诗 10:14；72:12~14），支持他们刚强奋斗。基督透过在世的具体服事，他的受死与复活，确立和平与公义的国度。神国的记号，反映在神的子民身体力行见证整全的福音（加 3:28）——扶助贫困、维护公义、消除歧视、承担环保。

救赎观：基督的代赎拯救穷人脱离自卑的自我认知与受罪欺压的处境，穷人在基督里与教会内经验接纳与复和（弗 2:10）。新生命的转变，缔造新的人生意义，激发改善生活的动力，从而改善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穷人不再看自己为受害者，他恢复尊严与其他被害者一起与贫穷争战。在十字架面前，人人地位平等；基督否定任何形式的欺压与滥权。十字架向有权势（企业商家）发出挑战，有道德责任与无权势者分享资源。扶贫表明信徒可在基督里蒙神救赎，得着释放（雅 1:26~27；加 2:10；罗 15:26）；并表明我们乐意与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教会观：世上的教会履行神国度媒介的使命，向世人见证三一

神本身的荣美。教会发挥救赎性(不应成为穷人接触福音的拦阻)、先知性(向不义制度作公义责备)、祭司性(促进不同阶层人士和好共融,可一起敬拜神)、君王性(作仆人般服事弱势社群)与普世性(与其他群体在服事穷人事工建立合一的见证)职事。

社会观:人绝不是独立而存的个体,而是生命相连的立约伙伴;我们看社会朝向“立约的有情群体”(Covenantal Community),其中生活的个体不应只为私利而活,学习透过施与受的睦邻关系,建立和谐共融、彼此关怀的社会。

这些神学观点对贫穷的论述,有助于对于香港的教会应如何响应当下社会的贫穷问题,实在很值得香港教会,特别是中产教会好好思量,教会有没有认真以上述的观点去思想贫穷人的问题,是十分值得探讨的课题。

无可否认,香港教会一向都有关注贫穷的问题,君不见近年的基督教界很快自行成立了一个基督徒关怀贫穷行动的网络,来响应并配合港府的第四份施政报告内的扶贫措施。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行动,然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教会支持这些关怀贫穷的行动,其实仍只在物质层面去响应这个贫穷的课题,可以达至的仍只是个人层面上的救赎而已;虽然从不同的个人的得救见证中,我们亦会感受到福音的大能;但教会亦须多从天国观和社会观去关注香港贫穷问题的源头,正如很多社会学者都一再认为我们的社会过分纵容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很少听到教会指出当权者的政策错误和不公义的地方,以致从而去挑战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正如上文在这方面的神学反省,教会要显出其教会观中“先知性”的角色,才合乎他存在的身份和职责。

因此,教会应多思量如何从社会层面上发出先知性的宣判和救赎性的宣告,使本来是属于上主的世界,再次被人认识他的美

善,亦使人能有机会活在一个更人性化的社会文化当中;这亦是龚立人在《救赎与贫穷》一文内所提出的救赎范围要做的事,教会才能在社会上扮演一个救赎文化的塑造角色,福音才能释放它的威力。

三、香港教会面对贫穷课题的展望

究竟基督教在响应香港的贫穷问题时,如何能够精益求精,更妥善和更有效?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没有?本人认为徐承恩先生在其《基督教与香港贫穷问题》的专文内提出从思维、策略及资源三个角度去继续探讨香港教会要发展的方向,十分有参考价值。它们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 扶贫的思维

1、社关思维要深化,社关神学须普及

上文已提及,基督教会一直都有关注香港的贫穷问题,并为此付出过不少努力。然而关怀社会的神学思想却尚未深化,并没有于布道、栽培、训练等事工中表现出来,不少福音信息及初信栽培教材没有提及社会关怀,平信徒亦大多未能将扶贫的观念融入他们的信仰当中。

当然,香港的基督教会已摆脱了昔日反对社关的思维枷锁,当务之急,在于建立社会伦理观及商业伦理观,令信徒晓得如何将社会关怀融入信仰当中。

2、建立一套基督教的经济伦理

香港福音派信徒的伦理观仍未能適切地响应贫穷问题。香港人普遍相信多劳多得,又或相信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基督徒知识分子,也会误解贫穷是个人素质所致,天真

地以为透过属灵的复兴,便可轻易解决问题。社会对弱势社群的种种结构性不公义,一般信徒只有有限的理解,遑论批判。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观的人,往往盲目相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万应良方,忽视了自由市场中的不公平问题。

商界的基督徒其实可以担当更积极的角色,因他们接收到较多第一手的商业信息,更能知悉财富的真正流向,因此也更能向教会反映社会财富分布的实况。他们处身于一个影响穷人生计的经济建构之中,故亦不能逃避伦理及神学上的反省。究竟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中该如何行事?在如此的经济制度下做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任职商界的信徒需要回答的问题。在西方社会,基督教的商业伦理已在不少机构付诸实行,商界的信徒对此已作出不少贡献。香港商界的肢体大可参考他们的经验,建构一套切合本土化的商业伦理,以教导其他信徒如何响应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问题。

(二) 扶贫的策略

1、正视引致贫穷的社会结构

一直以来,基督教的社会关怀都将重点放在“社会服务”上,对“社会行动”比较后知后觉,甚至抱负面的态度,认为社会行动有违圣经顺服当权者的教导。这种心态在福音派教会中仍是普遍。正如有学者曾指出近代基督教的社关策略,就像在拯救车祸伤者的同时,又反对他人提出改善道路安全的诉求。

在香港,基督教的社会行动到了70年代始成为气候,但投入的人力物力比社会服务更少,且不时遭到内部掣肘。即使近期教会开始重视社会运动,其力度仍有待加强。比方“关贫行动”虽有议政,却显得过于温文,只有言论而没有请愿、示威等行动;所发表

评论,亦大多只针对个别事件而非社会整体的结构。

重社会服务而轻社会行动的作风,令扶贫工作的成果大打折扣。社会服务只能响应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后果,而不能减少社会问题。香港的穷人数目众多,粗略估计也至少占全港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单靠社会服务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绝非明智。基于社会不公平的经济结构,香港的穷人并不能受惠于经济发展。这些因素一日不消除,穷人只会有增无减。社会服务必须有社会行动予以配合,方可针对贫穷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

2、加强政策研究及针对问题的扶贫行动

正因为贫穷问题源于社会结构上的缺陷,政策研究便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在社会运动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况下,要在政策研究上取得成果并不容易。基督教会很多时只能够和议其他团体的政策立场,或只就个别事件发表意见,却缺乏既植根于信仰,又能顾全整体社会利益的政策纲领。教会似乎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在学界、商界及政界基督徒的同心协力下,作出全面并深入的政策研究。而本土政治神学的建构,是基督徒响应本土社会问题的基础,也是不可或缺的。

面对香港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扶贫的方法不能一成不变。教会不单要提供服务或援助,还须要思索如何为穷人争取更多发展的机会。以“关失行动”创新行业的方案为例,以及从一些牧者曾提出的,透过建设小区经济来舒缓失业压力等建议来看,教会目前的方向虽然正确,可行性却令人存疑。此外,教会目前的扶贫策略也未能针对穷人的实际需要。香港的穷人多为缺乏积蓄或社会保障的老弱残病,以及被迫失业或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低学历人士,然而教会的社会服务或社会行动却很少是针对这类群体而作。要具体地解决贫穷问题,我们应集中资源去满足这些群体的需要,比

方替老人争取退休保障,又或为低学历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及就业辅导等。

“商界的基督徒”可以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发展经济及营商上的经验,正好为制定扶贫方案提供所需的专业意见。教会不应倚赖政府的资助,却应自力经营及发展,以适切的方案帮助不同处境的贫穷人士脱贫,令扶贫行动在有利或不利的环境中都能持续发展下去。

堂会也可在扶贫的新策略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改善与小区的关系,积极参与小区事务。他们可与区内的居民同行,甚至领导居民争取权益,又或作为小区扶贫工作的领袖,凝聚区内关怀贫穷者的力量。此外,堂会也可联络区内的贫穷人士,关顾他们身心灵的需要,并让他们有机会互相认识,彼此支持。穷人亦可在堂会的协助下,成立互助组织,合力为自己的需要发言。如此既可为贫穷人“充权”,亦可避免他们的社会地位被边缘化。

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多年来已负起了政府社会服务代理人的角色,这会否令教会失却自主权呢?教会的服务又会否因此失去本身应有的特性呢?在“服务代理人”这角色下,教会须提供政府要求的服务,以致这些服务往往因而变得世俗化,甚至与一般志愿团体的服务无异。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三) 扶贫的资源

1、勿过分依赖政府资助,丧失主导权

香港教会自70年代开始逐渐承担起社会服务代理人的角色,而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资助,亦使教会倾向依赖政府的资源来提供社会服务。以90年代末为例,基督教便有47.3%的社会服务经

费来自政府资助。^①然而,随着政府缩减社会服务开支,教会的处境将日益困难。有论者甚至认为,没有了政府的资助,教会根本不能继续其社会服务的事工。

香港的贫穷问题存在着不少结构因素。若教会积极响应这问题,或会刺激既得利益者透过各种途径,以财政手段向反建制的基督教机构施压。另一方面,若基督教机构继续倚赖政府的资助生存,会出现一个恶果,就是迟早会丧失凭良心说话做事的空闲。其实,除了政府外,教会还可以从会众及社会取得资助。比方,截至2002年末,上述两个行动的基金仍未筹到其目标金额。至于社会方向,一直也有非政府的资源可供教会申请使用,例如公益金、奖券基金等。

2、为扶贫开源节流

解决资源问题的方法,不外乎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教会需要开拓在政府以外的资助来源。除了教导会众认识扶贫事工的信仰基础外,堂会还可以提供机会,让会众更容易参与扶贫的工作,比如举办类似差传年会的扶贫年会,又或成立堂会本身的扶贫基金等等。堂会在鼓励会众奉献时,不应只鼓励奉献常费或推介福音机构,也应多推介参与扶贫的组织;十一奉献的对象不应只限于所属的个别堂会,普世教会及其扶贫事工亦应为信徒十一奉献的对象。不少基督徒商人有较丰裕的收入,教会可加强他们的劝说工作,如鼓励他们捐出部分收益予扶贫事工,为失业的穷人提供职位,投资创新行业,以至将捐助扶贫列为所经营业务的社会责任及经常性开支等。对收入较高和较稳定的专业人士,教会也可鼓励他们除捐献金钱外,尚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或创意帮助穷人,又或

^①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九九香港教会普查分享交流会参考数据》,香港,1999年。

利用他们的人际网络推广基督教的扶贫事工。

教会亦可考虑帮助贫穷人士成立合作社,让穷人也有创业的机会,增强他们自力更新的能力。纵然合作社不一定能带来大量的经济收益,也不一定能使穷人自给自足,但至少可让他们有机会一展所长,靠自己的技能,彼此合作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无须一味依赖救济。这可以帮助穷人在经济上“充权”,亦不失为开源的途径。

在节流方面,教会可考虑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将资源改为用于扶贫事工,如减少非必要的植堂,甚至延迟购买堂址或装修堂会等。此外,将资源集中运用,也能替扶贫事工注入动力。大部分基督教团体的负责人都非长于理财,结果只会令资源囤积,又或分配不得其所。要是基督徒专业人士发挥所长,协助教会有效调配资源及令资源增值,对扶贫事工定有莫大裨益。

结 语

从“美善的服侍”一文^①,该文作者于1990年前往印度,短期参与那时仍在世的德兰修女在“垂死贫民之家”(Home for the Dying Destitutes)的工作。作者在文中提及一件事情:“那天我和一位印度同工抬着一大桶垂死贫民之家病人吃剩的食物渣滓和果皮,拿去附近的垃圾站弃掉,那儿附近也有一个贫民窟。我们还没有走到,有一些人老远看见,便站在垃圾堆中等待了。一待我们放下那桶已有点发臭的东西,他们便在乌鸦、苍蝇、蛆虫和恶臭中,均分这些‘食物’。我回到垂死贫民之家的时候,心中忐忑不安,久久不能

^① 王志学,“美善的服侍”,《今日华人教会》,1990年12月,第17~20页。

平静……我想起一位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弟兄说：‘倘若我们所传的福音，未能对应人群处身的环境，在他们眼中，福音只是另一堆垃圾而已。’”

福音如何不会成为只是另一堆垃圾，香港教会实在要深切反省，如何面对贫富不均，甚至贫富悬殊一直扩大的香港，我们不是独善其身，而是道成肉身，去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圣经》的教导，去着意地关怀贫穷的市民，为社会结构性的不公平制度发出上主公义的声音，这真是现今教会的当务之急和一个严峻的考验，免得我们和主再来时被主责备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被主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参考书目：

1. Nicholls B.J., Wood B.R. Ed., *Sharing the Good News with the Poor*, India: Baker & Paternoster Press, 1996.

2. 周永新，《富裕城市中的贫穷——香港贫穷现象剖析》，香港天地图书，1982。

3. 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1993。

4. 郭乃弘，《迈向新世纪的香港教会》，香港基督徒学会，1998。

5. 莫泰基，《香港灭贫政策探索》，香港：三联书店，1999。

6. 陈慎庆编《时代的把脉——福音与香港社会的边缘人》，香港基督徒学会，2000。

7. 廖五妹“谁是‘贫穷人’？——香港穷人实况的社会分析及神学讨论”，《时代的把脉——福音与香港社会的边缘》，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2000。

8. 马碧容,《贫富悬殊——人种角度:香港的贫穷含意》,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

【期刊】

9. 王志学,“美善的服侍”,《今日华人教会》,1990年12月。

10. 孙励生,“香港社会里的贫穷问题”,《思》,第40期,1995年11月。

11. 何溢信,“从圣经神学看社会公义与贫穷”,《思》,第40期,1995年11月。

12. 陈瑜,“如何解决香港的贫穷问题”,《思》,第40期,1995年11月。

13. 胡志伟,“关怀贫穷行动的神学反省”,《时代论坛》,第684期,2000年10月8日。

14. 龚立人,“救赎与贫穷”,《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31期,2001年7月。

15. 徐承恩,“基督教与香港贫穷问题”,《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2003年7月,第35期,第177~204页。